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xiaoshuo richang huayu de xushu boyi yu wenhua jiangou

小说日常话语的 叙述博弈与文化建构

孙国亮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1074)资助

小说日常话语的 叙述博弈与文化建构

孙国亮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日常话语的叙述博弈与文化建构/孙国亮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71-1327-5
I. ①小… II. ①孙…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779 号

编辑/策划 许 铭 江振新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章 斐

小说日常话语的叙述博弈与文化建构

孙国亮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95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327-5/I·222 定价:30.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以小说日常话语——“粗口”、“实录”与“闲聊”和方言为研究中心,通过分析“粗口”叙事与小说的“政治寂静主义”,“实录”、“闲聊”与“操作主义语言”的病灶,方言写作与“飞地”抵抗的文化政治愿景等,考察日常话语、文学雅言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博弈,既探究了小说叙述话语的重塑过程,又揭示了文学生产通过谋求“声口”发生的变化,重新激活了文学介入社会的能力,剖析了转型期中国文学别样而复杂的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化政治图景,诠释了文学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演进诉求。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和框架 001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008
- 第三节 八、九十年代话语权的斗争及研究对象的介入 018

第二章 “粗口”的叙事“革命”与“政治寂静主义”滥觞 035

- 第一节 “粗口”的叙述表征及其“柔软的暴力” 035
- 第二节 “粗口”的时代特征及其文化政治表征 053
- 第三节 “粗口”的“占位策略”和意义 073
- 第四节 “粗口”叙事对“财富道德话语”的建构 085
- 第五节 “侃(砍)”平：在“粗口”的狂欢中继续“革命” 096
- 第六节 侃痞：新阶层及其“政治寂静”的修辞表达 109

第三章 “实录”“闲聊”的有限意义与“操作主义语言”病灶	126
第一节 “口述实录”：日常话语对“雅言”的反动及其局限	126
第二节 “妇女闲聊”：日常话语的敞开与主体转向	142
第三节 “口述”与“闲聊”：日常话语沦为“操作主义语言”的技术性分析	160
第四节 “实录”和“闲聊”：作为操作主义语言的过滤功能	172
第五节 “群似化”：小说创作的危局与症候	178
第四章 方言写作的“飞地”抵抗与文化政治愿景	187
第一节 方言写作与“飞地”营造	187
第二节 “飞地”抵抗与文化政治愿景	196
第五章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0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和框架

伴随着先锋试验的退潮和“纯文学”的消弭,小说叙述的一个颠覆性现象是大量的日常话语,比如“粗口”^①、“大话”、“闲聊”^②、“方言”等,大规模进入文学雅言系统,形成了“叙述声口”的变异^③。本书选取了在小说叙事中表现较为典型的日常话语——王朔的“粗口”^④、安顿的“口述体”和林白的“闲聊”以及韩少功等小说的“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既从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日常话语对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效用及其自身衍生的新特质,在诗学和修辞的维度考察其对文学

① 露丝·韦津利论证了粗口的意义和价值,可参见韦津利:《脏话文化史》,颜韵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

② G. 法兰克福论证了闲扯的意义和价值,参见法兰克福:《论扯淡》,南方朔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

③ 在此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本书在较多层面上审视研究对象作为反叛的“粗俗文艺”的范畴,而尽量减少在“通俗文艺”层面人云亦云;当然,不可否认,像王朔等人的小说既有“粗俗文艺”特质,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通俗文艺”的印痕;关于“粗俗文艺”与通俗文艺的区别,以及“粗俗文艺”向通俗文艺的滑变,详见帕米拉·罗伯森:《对麦当娜谈什么? 何时谈麦当娜?》,《俗文化透视(先锋译丛9)》,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④ 事实上,在王朔“横空出世”之前,“粗口”叙事已经在80年代文学大行其道。比如《1985—1986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中收有《狗日的粮食》、《窑谷》、《你不能改变我》、《他在拂晓前死去》、《这是一片大海滩》、《继续操练》等14篇小说,有脏话表达。《1984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中亦有《麦客》、《最后的壕沟》、《姐姐》、《危楼记事》、《父亲》、《惊涛》等多篇粗口成脏。

的正负两面性影响;又从文化研究的话语分析视角,采用“互文性”的多文本并置解读,将小说日常话语纳入整个社会文化和文学实践的大情境中进行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性观照,将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加以整合,尝试在文化霸权斗争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揭示在新意识形态压抑机制下,文学生产利用“日常话语”的发声策略,激活文学介入社会生活、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呈现日常生活和解放政治之间的矛盾和症候;其中,小说日常话语与文学雅言话语,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博弈过程和文化政治诉求,是本书的创新和研究的重点。

首先,“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话语的变化与社会政治话语的整体秩序密切相关,特别是后者的民主化、商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①,使得权力话语对文学,乃至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和规训变得隐蔽而又微妙^②。福柯的权力话语分析尽管有很强的适用性,但在一定意义上仍显得过于宏观和武断^③,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主化”已经有意识地“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的不平等和不对称”^④。许多边缘化的日常话语和声音已经被文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接受和租用;比如,王朔的“粗口”,安顿的“口述实录”,林白的“闲聊”,乃至各种方言小说,电台、电视台的各种日常谈话节目等等。而话语的“商业化”,引入“自由消费”概念,既积极又消极地配合了所谓的“民主化”,实现了主体的“自动操纵”,小说的日常话语在一定程度上

①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② 福柯强调权力主体通过种种“规训的手段”产生它所要求的“驯顺的肉体”。现代社会,权力无孔不入,并具有隐蔽和微观的特征。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话语,亦对其它类型话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控制和矫正,要求其它话语服从和配合,从而达到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秩序的目的。“规训”的含义主要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规范与整合,文学的审美之维遭受压缩、扭曲变形。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③ 佛克马和蚁布思批评福柯有“话语决定论”(discursive determinism)的倾向。具体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④ 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落入了话语“商业化”的圈套^①。加上话语“技术化”的手段和策略,使得话语更具隐蔽性、扩张力和包容性,从而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向日常话语和生活的渗透和殖民;这其中,文学又扮演着一个霸权斗争的平台作用,甚至是某些负面的帮闲角色;在实际的话语“民主化”过程中,充斥着诸多的伪饰性变化,日常话语通过“自主学习”,与公共话语实现了合谋和霸权模式的共建^②。比如,这尤其表现在安顿的“口述实录”中。正如南帆所言:“现代社会,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产。话语的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其次,基于话语权力和秩序的变化,本书提出“日常话语”这样一个既具有操作性,又更具复杂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日常语言重新大量地介入当下文学,显然与以往意义不同^④。体现了日常生活的回归和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趋向。日常话语包括了“日常语言和非语言两种要素”,所以它既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日常语言,又包括日常语言制造的知识 and 表征,如身体语言和日常行为语言等。比如,安顿在“口述实录”中,就常常用肢体语言来“引导”她的“口述者”,从而制造有用的“文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力关系是多重的,资源是复杂的,而

① 按照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的观点,语言扮演了符号权力的角色,发挥了语言暴力。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他进一步指出,符号暴力揭示了任何权力系统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② 权力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压抑”,言说者也在“主动”迎合权力话语。正如福柯所言“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在意识形态话语发力之前,其他话语先进行了自我审查,自我抑制,自我“规训”。参见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1999年,第218页。

③ 南帆:《文学批评与意义再生产》,《理论的紧张》,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日常话语曾经多次被主流意识形态策略性地挪用,介入文学。如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40年代的工农兵文艺、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等。但是,90年代,日常话语再次介入文学,却与以前的被动性征用大不相同,其中既有被动性又有主动性,也不乏策略性。

不是一种线性的、由上而下的宰制,它是对以“科层制”为思维模式的现代性话语权力关系的颠覆。而事实上,在话语“民主化”的今天,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力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更为松散的竞争,不断挑战的过程,甚至是相互“邀请”的介入和借鉴学习,而不是被一个潜在的结构决定了^①。日常话语的概念将有助于将文学和文化研究从知识——权力的干预逻辑中解放出来,从而展示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是意义协商和被不断界定的竞技场^②,探索文学在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实践可能。

再次,参照社会学家吉登斯和鲍曼的观点,日常话语在当下文学中的重新复活,既体现了当代人走出宏大的“解放政治”的藩篱,通过在微观层面上反思自身性,获得对“生活政治”的诉求,又体现出当代社会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新特征。“生活政治”在使人们回归自我的同时,又遮蔽了人在更高层次上解放的潜在可能,导致了自主性的降低^③。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跨越,既昭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部分失效,又彰显了其与时俱进,效力无边^④。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

① 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是弥漫性、非中心的,它并没有什么中心点,它无所不在,是流动的,而且不完全固定地属于任何个人和集团。“像是毛细血管进入到人们的肌理,嵌入人们的举动、态度、话语,融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中”。它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宏观政治体系之外的“新的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政权。”杜小真:《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② 当象征性暴力实施影响时,它呈现出“以理服人”和“彬彬有礼”的文明方式和过程,它宁愿采纳不露声色和静悄悄“屈尊策略”的方式,在对话中,不知不觉地征服它所要征服的对象。被统治者甚至不惜就这样认同了统治者的统治,达成了“合谋”。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③ 郭警天:《自主性的降低——吉登斯和鲍曼对现代性的微观分析》,《社会》,2004年第4期。

④ 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鲍曼用“政治”和“生活政治”分别指涉其中的相关性和相异性,同时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正是政治向日常生活的转移,使得政治(包括与其相关的各种权力机制)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和意义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确立的“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的观点”——这不仅没有消解政治对人的控制,恰恰相反,它使得政治更加“无所不在”。就像萨义德所说:“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循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现代性在根本上已经时间化,是一种“流动的液体”,这种流动性和扩张性要求取消“边界”,有效地改变了空间的“固体”状态,将一切的一切都纳入到被“生产/复制”之中。

本书对文本的分析解读和价值判断。“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变迁,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暴露了现代性视野下的“解放政治”的缺陷。而“生活政治”告诉我们:个体的自我认同,最终取决于他自己对生活方式所做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自主的,而且是与集体和社会相关联的。它不仅是个人生活的政治,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鲍曼所言:流动的現代性要求一切边界的取消和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规训和统治将在一个更为广阔、潜在的领域里继续存在,而反抗的斗争更是一场没有硝烟、悄无声息的艰苦历程^①。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解放政治”的宏伟愿景的话^②,那么,日常话语的介入,无疑是对“生活政治”的直面和反映^③。

日常话语对小说的介入无疑是多样的、复杂的。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一点:日常话语不像文学雅言一样具有“专业性”,恰恰相反,其特点是人人都说的“普世性”。这既为其进入小说叙事、反抗话语权力和规范带来便利,却又常常掩盖了诸多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追问:日常话语是谁的日常话语?它的“普世性”特点是否与主流话语“民主化”的趋势具有同构性?知识分子用日常话语叙述是否就意味着显示了民间立场?知识分子的日常话语叙述能否代表底层发声?日常话语有无阶级(层)性?日常话语在何种纬度上介入了文学雅言,它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改造和利用?日常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抵制和反抗以何种方式展现,意义如何?等等。当然,进入文学叙述的日常话语无疑是种类多样的,但

① 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現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② 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见何言宏:《中国书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该论著通过对大量获奖小说的案例分析,点出了80年代文化霸权的复杂性,以及文学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契合性与同构性。而笔者认为,追求“纯文学”的先锋试验小说,无疑也是在另一个面向上追求“解放政治”,而忽视了对“生活政治”的认真思考。

③ 关于日常话语入文,需要适度,如果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鄙、简陋、混乱以及贫乏,笔者在论述过程中尽量始终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

是本书基于对以上诸多问题的讨论,在具体论述中,选取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日常话语介入小说的三个重要现象——王朔的“粗口”、安顿和林白的“口述”和“闲聊”,以及小说写作的“方言”为研究对象,它们与文学话语的转型直接相关,而且,表征着中国话语与社会变迁的要旨。

第一,王朔的“粗口”与小说的“政治寂静主义”,主要展示话语民主化和商品化背景下,日常话语与雅言和主流话语的霸权斗争和博弈过程。以王朔的“粗口”作为考察八、九十年代话语和社会变迁的“声口”,展示日常话语“柔软的暴力”和在中国语境下介入文学雅言系统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及其对“解放政治”话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粗口”的广场性、物质性、大众性和商品性等时代特点,体现了中国社会生活和话语变迁,既有效地填补了知识分子和“雅言文学”从现实生活抽身后遗留的“话语空位”,又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新意识形态对“革命道德话语”的批判和对“财富道德话语”的建构。“侃平”作为话语民主化的表征和手段,凸显了“粗口”作为一种阶层建构的符号和策略;由此,形成了“侃痞”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特阶层,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中产阶级”雏形,与知识经济造就的“新中产”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他们的阶层诉求和反叛,注定使小说的日常话语在“狂欢”中贬值;“粗口”的语言冒犯是“政治寂静主义”^①的一种修辞

① 参见福柯:《我为什么研究权力——主体的问题》,载于《权力的消息》,斯图加特出版社,1999年。其中对“教会的新权力”的论述。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来源于17世纪基督教的一个神秘化分支——政治寂静教。福柯认为,国家权力其实是个性化和统一性相结合的一种权力形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存在着个性化技术和统一程序“纠结”在同一政治体制内的现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拾一种古老的权力技术,并把这种古老的权力技术整合到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中,这种古老的权力技术就是起源于基督教机构的教会权力。如今,教会权力本身可能已经丧失,但它在教会机构之外所起的广泛作用却还存在。“18世纪左右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这种教会的个性化权力被重新分配、重新组合。我认为,‘现代国家’并非是轻视个体存在的一个实体,‘现代国家’并非不想知道这些个体是谁或他们究竟是否存在。恰恰相反,现代国家已拥有完全可以将个体的人融入其中的精密结构;前提是:国家中的这些个体被整合到一种新的形式中,并受制于一系列特殊的模式。即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国家是将各个体的人层层压叠起来的一个大岩层,它是教会权力的一种新形式。”“它仅仅通过语言即可生产和制幻新的信仰。”另可以参见斯普林科:《想象的关系》,其中有伊格尔顿以“政治寂静主义”抨击德曼将语言置于政治之上的论断。

学表达,搁置了价值的判断,拓宽了主流话语的边界、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稀释功能。能指和所指的断裂,暴露了“粗口”泡沫下的政治寂静和无害,揭开了 90 年代小说走向“政治寂静主义”的序幕,此后,风靡一时的“大话系列”和网络文学“口水秀”即为明证。

第二,“实录”和“闲聊”走向“操作主义语言”的技术化分析,主要揭示在话语民主化、技术化的背景下,日常话语如何被雅言和主流话语改造和操控的过程。通过分析 90 年代红极一时的“口述实录”和新世纪轰动文坛的“妇女闲聊录”,展示日常话语对文学的积极介入,对“雅言系统”的反动和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敞开”,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弱势的女性群体“发声”的能力。这其中既有话语“商品化”的操纵,又有主体的姿态性转型。其中知识分子话语通过“拟定话题”、“咨询性引导”、“隐形的权威控制”、“富有人情味”、乃至“话语权的有限转让”等“技术化”策略,连同主流话语无所不在的“笼罩”,较为详细地揭示了日常话语被有效渗透、影响和“操控”的过程,从而沦为马尔库塞所谓的“操作主义语言”,起到了弗洛姆所说的“语言的社会过滤器”功能,导致了小说叙事“群似化”的恶果。

第三,方言写作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内部^①的飞地^②抵抗与文化愿

① 参见朱耀伟:《他性机器:后殖民香港文化论集》,香港青文书屋,1998 年。其中有民族国家内部因为差异性而导致的内部殖民问题,即殖民的“内卷化”。

② “飞地”,在地理空间上,是被外围领地包围的土地,与周围环境和条件迥异;在文化上,相对完整地保存着一种外来的、异质的“声口”和非物质文化的形态;在政治上,是一个政治抵抗色彩较为浓厚的概念。本文所论及的“飞地”,是指如韩少功的“马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张伟的“胶东”、阎连科的“受活庄”、李锐的“吕梁”、孙慧芬的“上塘村”等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鉴于“方言写作”在建构“纯文学”,如塑造人物形神、传递别样情致、承继地域文化、提升文学审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已被学者多次论述,故本文的重点在于阐释“飞地”这一文学地理空间的文化政治学意义。关于飞地的文化政治性含义有二:一种认为是消极的,如博格斯这样描述:“用普洛特·加龙省金的话说,即是,受反对精英控制的道德愤怒所鼓舞……飞地意识主要将政治激进主义和普通人的反抗纳入了‘别干预我们’的需要之中。在特征上,它是保护性的、排它的和反动的,因此产生的政治是‘地方小区的地缘政治’……每个飞地都变成了一个微型堡垒。”参见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40—241 页。另一种是积极的,如詹姆逊便认为苏联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下的一块飞地——抗衡着资本主义。因此,也是乌托邦的代名词。詹明信认为,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这种乌托邦想象。参见 Fredric Jameson: Five theses on 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 Monthly Review, April 1996; Vol 47, Issue 11.

景。鉴于“方言写作”在建构“纯文学”，如塑造人物形神、传递别样情致、承继地域文化、提升文学审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已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故本书的重点在于阐释方言营造的“飞地”这一文学地理空间的文化政治学意义。分析“飞地文化斗争”模式和策略，展示文化飞地这一特殊空间内部的日常话语对差异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认同，探讨在总体制度内部建立抵抗话语的可能性，从而部分改变日常生活被监控和规训的命运，摆脱所谓的“意义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之所在。然而，这种话语斗争和抵抗因为是内部的、臣属性的、分散的，所以，又是破碎的和不彻底的，当下方言小说发声的困境无疑证明了飞地抵抗愿景的艰难。

总之，通过研究小说日常话语与文学建构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其背后潜在的对官方话语的有限性认同和自发性抵抗、与书面语的拒斥、杂交和改造、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自我和群体认同、社会分层和阶层互动、社会想象和结构变迁，乃至阶层符号边界的确立，底层的文化悬置和建立文化抵抗“飞地”的努力，以此超越“解放政治”的遮蔽和缺陷，展望建构未来“生活政治”的愿景。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本书选取八、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日常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切入的角度，在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视野的开放性上试图有所突破。而小说自古就是“异体化生”^①的文本，语言时雅时俗，应境

^① 参见王一川：《汉语形象美学引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新潮语言阐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而生,勃然杂陈,正如巴赫金所谓的“杂语”或“众声喧哗”^①。而日常话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兼容性、演绎性、扩大化和包容性的概念,在本书中将策略性地代替日常语言,成为研究和论述的主角。

首先,从文学史的层面来说,日常话语(语言)对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不容小觑。在传统的教科书中,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粗鄙的固定的陈词滥调,是一种作家们所不屑的自动化语言,研究者一般对文学作品中的日常语言视为消极反面的俗套^②。但是,日常语言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却起着重要作用。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把文学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口语与俗语的运用上^③;梁启超回顾了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的兴衰与俗语的关系,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④。此后,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提出“平民的语言”、“不避俗字俗语”等口号;20年代的“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提倡语言的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表述的话语媒介,就是“竭力制造某种接近大众的符号”,知识分子“甚至不惜以分裂式的自我贬黜”谋求话语权,求得文学与社会的同构性发声^⑤;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纯文学的阴翳下,日常语言再一次大规模地介入文学,如王朔小说、新写实小说,方言小说等等。且不说日常话语在文学中能否真正表达大众的心声和对社会问题进行发言,大众日常语言作为一套话语实践的

① 巴赫金提出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指异质的、杂多的语言竞相齐鸣的情形,或者说社会语言的多样化、多元化状况。有关巴赫金的理论及有关讨论,可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及主编序言《理论是可以长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刘康:《对话的喧嚣——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参见吕特·阿莫西、安娜·埃尔舍博格·皮埃罗:《俗套与套语——语言、语用及社会的理论研究》,丁小会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王予霞:《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客家风情》,2002年第4期。

④ 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1903年第7号。

⑤ 参见南帆:《符号角逐》,《天涯》,2004年第4期。

媒介,就已经成为中国百年文学历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和客观存在的显著现象。

而这些“俗语”实践,与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霸权理论不谋而合。著名学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曾考察欧洲中世纪以后的历史,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催生了各种新型的民族语言,这些“日常俗语”导致了“神圣拉丁文”的衰微,造就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方言小说,也不可否认地含有地方性权利确认的诉求;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在《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中,认为“俗语”书写的文学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的建构之间有着必然联系^①。日本左派学者小森阳一在《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中,论述了日常话语制造的“言文一致的幻想”形成了日本文学现代性的诉求^②。由此可见,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日常话语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和课题。

其次,确立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体现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启示性和补充性应用。第一,重视日常语言在文学文本中的存在意义,打破文学的精英立场,符合文化研究作为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一个特殊途径。第二,日常语言行而下的品格和对生活的原生态临摹,可以更好地回应和介入当下的精神、文化和社会问题。这是中国文学目前最紧要和迫切的问题。第三,日常语言重新被思考,可以促进学科大联合。正如詹姆逊所说,在不同的文本和话语之间灵活地穿梭,以便促成所谓的学科大联合^③。第四,日常语言的引入,也与当下文化诗学中“文本概念扩大化”相适应。我们将文本视为一个开放的、“膨胀”的概念,从而跨越艺术性产品和其它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限。将文学文本看作是存

① 柄谷行人:《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学人》第九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②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在于作者、社会、习俗、制度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网络中的社会性文本，文本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而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被视为产生于一种结构和一种规训体系的历史之中。那么，日常语言也不再比文学语言低级，他同样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对象。

再次，日常话语（语言）的研究，能够破除文化研究中“话语—权力”、“文化—结构”的线性干预逻辑，真实再现政治、权力的复杂结构，明确反抗的机制和目标。当法兰克福学派在“召唤”、“笼罩”中陷入悲观，个人的主体性和反抗几乎不可能；当福柯“取消了作者”^①，取消了文学作为“非话语”的存在特权后，主体反抗的位置没有了，这足以令人悲观。但是，同样也可以乐观地说，主体反抗的位置伴随着权力的无所不在而无所不在了。布迪厄对经济本质主义的线性决定论，进行了关系主义的改造，指出阶级和权力区隔表现出来的也是文化区隔、政治区隔、生活风格区隔和一切日常实践的区隔，尤其是美学趣味的区隔。因此，社会学中的阶级政治分析，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性情等符号的分析，涉及对社会世界表征权的争夺。当我们引入霸权和对话理论时，我们发现文化与政治变迁的诡秘踪迹，我们会发现文化空间其实是一个竞争性空间，其中权力的支配性是协商的、复杂的、网状的、甚至是共谋的。被统治阶级并非没有话语的权力，最起码他有“给定”的权力，或者有获得权力多样化的渠道，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②，且不管这种给定的权力在文学中的话语表征是否值得研究，但至少，其“权力给定”的原因、范围以及表征的形式和方式等等，却可能隐藏和暴露不少玄机，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话题，而且，被统治阶级获得权力的渠道也是值得关注的。在

① 福柯：《作者是什么？》，参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459页。

② 参见胡必亮：《关系共同体》，人民出版社，2006年。